

# 1 叛国谬论—— “曲线救国”论

1939年初始，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出了一种叛国谬论——“曲线救国”论。

“曲线救国”论，是由国民党河北省军民总指挥张荫梧最先提出的。1939年初，张荫梧在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把柴恩波率部投降日军后任“中剿匪总司令”的叛变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1939年4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颁发的秘密文件中也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则可略走曲线。随后，这种论调在国民党顽固派中十分流行。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文武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其中有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5个支队投敌，计2万余人，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率部投敌；1942年4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南率第六十九军暂编三旅、特务旅投敌，随孙投敌的还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翰、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峻峰等。之后，国民党大

批军官起而效之，先后投敌的有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第一二九师师长王劲哉、第六战区挺进军总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金亦吾、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等。1943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孙殿英联名通电投敌叛国。7月，国民党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陈孝强在山西公开叛国投敌。在此前后，国民党文武官员中降将如毛，降官如潮。

至1943年8月，国民党的叛国投敌人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投敌的军队达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62%。这些军队变为伪军，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严重妨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



## 民族罪夫人千古遗臭

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938年12月31日，何香凝在香港著文，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在港之参政员张一麟、胡景伊、陶行知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林森，请除汪精卫各

职。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关于汪精卫案件，经表决，会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称：“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悖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呈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汪之所言，不特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同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亦通过上述决议。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

1月1日，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胆敢身为傀儡、潜作汉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为国人所共弃者，责成军事委员会切实查明，按照《惩治汉奸条例》严缉惩办。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表明国民党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裂。

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

称汪在其政治生涯中时常改变趋向，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力量。

当天，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发表讨汪声明，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缉汪。

东北救亡总会通电声讨汪精卫，指出汪逆叛党叛国，党纪之外，应绳之以国法，其他妥协调摇分子，亦应予以有效制裁。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胡愈之、史良、沙千里等 20 人发表声明，通电声讨汪精卫。

香港群众愤怒声讨汪精卫，并破坏发表艳电之《南华日报》。香港救亡团体香港妇女慰劳会、中国青年救护团等联名通电讨汪。



## 日军轰炸重庆

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始于 1939 年 1 月。1 月 10 日，日机 11 架首次飞袭重庆。15 日，日机 27 架再度袭击，投弹 58 枚，毁屋 20 余栋，死伤约 300 人。进入 5 月以后，日军飞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轰炸行动。

5 月 3 日下午 1 时许，日机 45 架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 2 架。日机 36 架侵入市空，投弹百余枚，重庆大樑子、苍坪街、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等地，均被炸起火，死伤市民约千人，



日军轰炸重庆后，大火在燃烧。

毁房数百间。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都邮街、柴家巷等繁华市区尽毁，火头达14处，电话、电信、电灯、自来水系统均被炸毁，全市陷于烟火之中。总计两日轰炸，重庆市区房屋被毁1200余栋，市民死亡4400余人，伤3100余人。

蒋介石借“五·五”纪念机会，召集党政军各机关首脑谈话，商讨动员人力物力，实施紧急措施。当即决定：（1）开辟市内火巷，应从速进行；（2）集中一切公私车辆船舶，输送难民；（3）由政府速拨巨款，办理一切救护事宜；党政军各机关文官荐任以上，武职官校官以上之人员，至少捐薪一月，作救济难民之用；（4）动

员全市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员、公务员并各属士兵，协助防护救济工作；(5) 指定由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统一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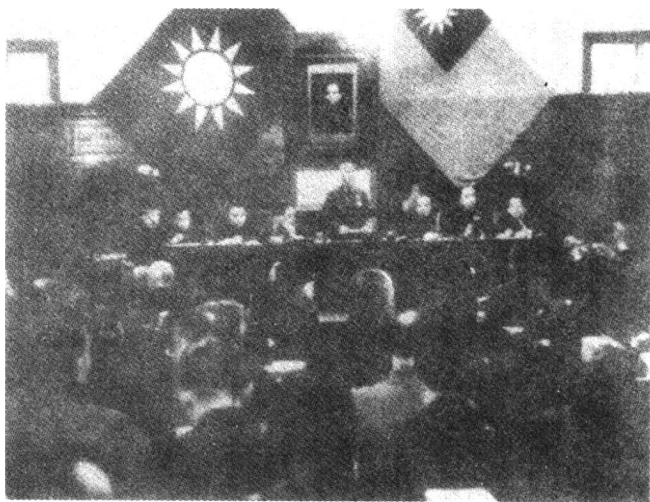
随后，何应钦召集有关机关首脑会商，设立空袭联合办事处，认为以运送老幼妇孺离开市区尤为急要，决定统制公私船舶车辆，免费运送。所有各机关汽车一律出动，并于难民集中地点，分别派员照料。此项疏散工作，从 5 日至 7 日，有统计可查者达 25 万人。5 日，赈济委员会拨款 100 万元，急赈被难同胞。

5 月 5 日，重庆《时事新报》、《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因日机轰炸，水电、交通及印刷发生障碍，奉军事委员会令一律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以程沧波为主任委员，黄天鹏任经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芸生任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崔健吾任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办事处设时事新报社。

5 月 25 日，日机 39 架分三批空袭重庆，因中国空军起飞近战和地面高射炮阻击，首批日机被击落 1 架，二、三批未能进入市区。

# 4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有 155 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王法勤、丁惟汾、于右任、居正、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孙科、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 11 人组成主席团。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后举行的首次中央全会，会议全面讨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中的政治、经济、对日外交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心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演说。他宣布广州、武汉失守以前是抗战第一期，而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是抗战第二期。“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绩的目的”。但是在谈到抗战到底的“底”字时，蒋介石强调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中国亡了才真正到底！必须有一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者说武汉失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在卢沟桥事变前的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现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可见，蒋介石所说的抗战，说到底就是要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东北可以不要，华北也可以维持形式上的统治，只要能保存与四大家族及英美利益关系最大的华中与华南，即可牺牲中华民族的重大权益，与日本罢战言和。这一演讲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在新形势下

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的本质。

其次，蒋介石在会上还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他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包括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危险”。在《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中，蒋介石又提出在最近半年中必须增加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至少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 20%。会议根据蒋介石的上述讲话精神，通过了《改进党的工作方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议案，规定以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为今后党务工作方针，强调国民党要适应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进行工作，加紧组织的发展和思想的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和基层的控制，力谋新生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等。

蒋介石的两个报告及全会作出的整理党务的决议，说明国民党顽固派扩充实力、迅速右转的新动向。

再次，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加强保甲编制，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领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

在异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受异党分子利用而受其利用；

对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可随时派兵解散；

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工、罢课、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制裁；

规定各地党部密饬全体党员，注意以启迪其警觉性，并饬令经常调查异党之组织活动情形报告党部，以作随时应付之根据。会后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的办法》、《防止异党兵运动方案》等。

这些文件规定：

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绝对不准自由招募，尤其不准就地征粮或收缴民枪，乘机扩大私有武力”，“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在行政上“绝对否认共产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共产党在华北各省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其所组织之各县地方政权，应严令解散，所发行之货币，责令其负责收回，否则以军饷作抵”。

最后，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党政军系统，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会议专门制定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详细规定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委员长的职责和权限等

问题，其中第二条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本党总裁任之”。“由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 11 人为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以委员长为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时，指定常务委员一人代理之”，“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可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据此，会议还通过了《拟请通飭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要“服从最高领袖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并代表全家发誓遵守抗敌公约，不做汉奸，宣誓后如违背誓言，要依法治罪，妄图以此对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严加控制，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权上的进一步法西斯化，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日战争开始时的比较积极地联共抗日，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5

## 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 委员长

1939 年 2 月 7 日，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决

议，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关于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原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称，综合国防最高会议十月来之工作以观，认为确能适应当前抗战建国之需求，而圆满行使其职权，用能团结全民，集中国力于抗战建国之鹄的，使为有效之运用。惟现值抗战进入第二期，全国精神物质之总动员已成为迫切之需要，而所以发挥总动员之效能者，尤有赖于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统筹全局，使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悉贡献于抗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分，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指挥。

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者，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并由委员长指定其中 11 人为常务委员。为执行决议案，特设执行委员若干人，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各部部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行政院秘书长、各部会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军法执行总监办公厅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海军总司令、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组成。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可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

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常委为五院院长、外交部长、正副参谋总长及中常委3人共11人，秘书长张群。该机构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及秘书厅、参事室等。所属机关有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负责实施行政三联制；另有总动员委员会、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第二期战时行政工作考核团、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物价审查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等临时机构。



## 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

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 1938 年夏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早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

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38 年 12 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

决不应轻易放弃”。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要求撤换鹿钟麟，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对于非理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央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磨擦的谈判斗争。然而，国民党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梧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二支队和中共党员及政工人员。

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梧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央地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三个月内，此类暴行竟达15起之多。6月11日，张荫梧率民军三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了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张部其余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

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域”，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

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涉”，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反共磨擦事件便不断发生。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五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护送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专门发出指示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

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制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共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共领导的一切报社、书店和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书报刊物。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反共分裂活动：

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

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柘邑事件；

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

在湖南制造残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

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 500 余人；

在河南制造残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 200 余人的“确山惨案”。

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的严重局势，中共中